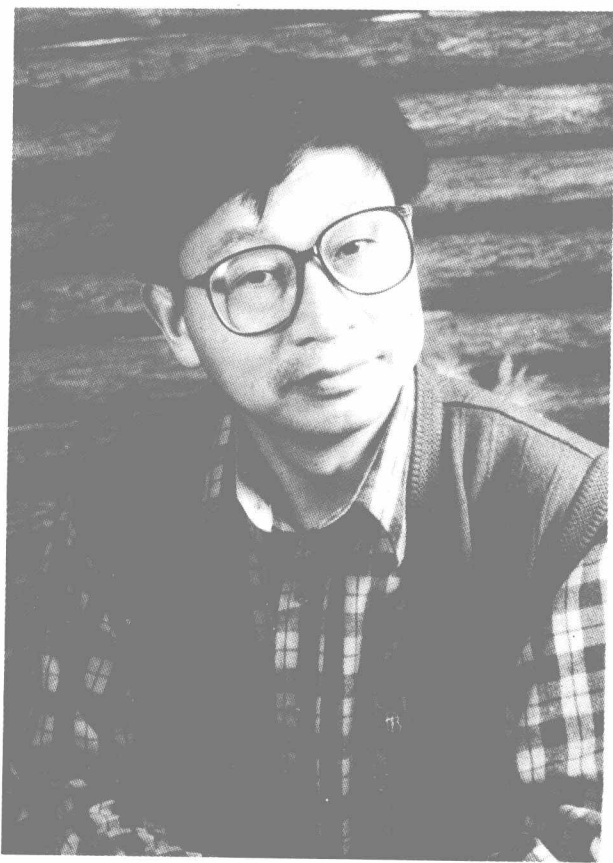


向继东\著

XIN XIANGJUN WENCONG

生活没有旁观者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

总 序

邓友梅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去湖南参加毛泽东文学院落成典礼。面对建筑规模壮观、风格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文学院,我惊叹曾涌现出“文学湘军”的湖南人的气魄,并衷心祝愿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学院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学院落成后,主事的朋友来函,希望聘我担任该院的客座教授,出于对文学院的感情和友情,我应允了。我在回函中说,不知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在湖南多次听到一个口号:重振湘军雄风,再造文学辉煌。这是个鼓舞人的口号,但照实说,要实现这个口号并非易事。创作实绩,需要一点一滴积累,需要寂寞与艰辛。湖南是文学大

省，湖湘文化土壤深厚，重振和再造寄望于后来者。

据我所知，湖南近年来创作十分活跃，其间不乏才华初露的青年作家，对他们，确需切实扶植和培养。毛泽东文学院在初创之即，便在全省遴选了十多位中青年作家，为他们编选作品集，名之为《新湘军文丛》，实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切实扶植和培养的措施。所谓“新湘军”，是相对于曾经辉煌过的“文学湘军”而言的，也表明这批入选作家大多已取得了相当的创作成就。我作为一个文学老兵，是深深地寄望于未来一代的，愿新湘军再造辉煌。

一九九九年夏于北京

序

邵燕祥

一个是，人头落地，还连称“好快刀”；一个是，临刑画押，只顾惋惜圈儿画得不够圆。这都是小说家言，却不失生活的根据。后者糊里糊涂地挨了刀，前者挨了刀还照样糊涂着。

死得不明不白，是因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糊里糊涂就死，是因为活着时压根儿没明白过。

拿我自己说，肉体生命，苟延至今，政治生命，处决者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经回首，这才有点儿恍然，倘在反右派运动里死去，念念“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的心态，何异于连称“好快刀”的人头；倘在文革中“为革命牺牲”，斤斤于定案材料上枝枝节节字字句句，岂不又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阿 Q！

于是从不知不觉而达到后知后觉，深知有些历史，有些现

实,有些道理和有些没道理都需要弄清,认为只有如此,才不致糊里糊涂地死去,而死得明白。

二十年来,如果说我又有所进步,就是认为不光是图个死时明明白白不糊涂就算了,而且是活着,要明明白白地活着,做个活得明明白白的人。

但实践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多不容易!

世界之大,之复杂,或者说中国之大,之复杂,不是想弄明白就能明白的。以你个人,能够占有多少材料,且是真实可靠的材料,你能洞察多少幽微,包括预见到若干变数?认识是伴随着实践过程的一个歧异纷出的过程。即使你轻易地克服了自己的偏见和成见,你还得经历诸多认识上的困境与穷途,迷茫与困惑,才可能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也许真的,到最后一息你还发现了近期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但你对此是自觉的,则庶几是个力求明白的明白人,甚至可以说达到或接近大彻大悟了。

知彼和知己,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主观世界,都是没有穷尽的。认识有深浅,不安于醉生梦死就好。戏剧大师曹禺年轻时写的话剧《北京人》,有一个最年轻的角色瑞贞,可能是剧作家寄予厚望者,说了一句话:“多少痛苦,才换来一个明白!”由于认识的不可穷尽性,也许我们自以为明白了,其实还在糊涂着,但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之后,若没有这一点力求明白的自觉和努力,不是连自己都对不起吗?

远的不说,我们当代中国的思想者,我们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众多朋友们,二十年来主要就是干着这样一件事:为了大多数人能够活着,并且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写文章,写书,发表意见,帮助我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睁眼看自己,说不定我还囿于“坐井之观”,蜷曲在井中、笼中、瓮中、茧中。而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启蒙,我才像在一首诗中所说:知

道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我在中国的位置”，即使如有人说的是在“边缘”，只是十二亿人口中的一人，千百万脑力劳动者的一员，在生活中我也不是旁观者，更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和牲灵！

向继东是我的年轻朋友，他的写作，就属于在自己变明白的同时也帮助人变明白的事业。从懵懂到明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明天在那个问题上明白了一点点，就没白吃饭，没白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从不敢以明白人自居，但不愿意糊涂下去，让人蒙在鼓里，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样积小明白为大明白，倘再有人妄图施小伎俩，掩我耳目，扯谎骗人，欺压相加，我就可以从容地讥之以一句北京土话，曰：“谁比谁傻呀！？”

1999年4月26日

目
录

- 1 总序(邓友梅)
3 序(邵燕祥)

思想的风景

- 3 从李辉说到蓝英年
6 风声雨声读书声
12 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好
18 先行者并不孤独
23 思想的风景
27 历史是不能欺骗的
31 关怀人生和社会

- 36 文化的乡愁
- 41 重读赵丹的遗言
- 47 谁在欺骗自己
- 53 书法的另一种解读
- 56 历史的真谛

访谈与随想

- 61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
- 68 一种说话方式
- 73 彭燕郊谈艾青
- 77 战争状态下的人
- 81 电影人和中国电影
- 84 “刘罗锅”现象与思考
- 88 文化可否把玩手间?
- 92 吴祖光与“生正逢时”
- 94 株连随想

名人侧影

- 99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 106 画坛鬼才

- 113 走访寻墓者
117 速写吴祖光
120 酒仙张守义
123 于洋印象
125 张扬并未与官司握手
128 古籍狂人
133 画事当寂寞

一份备忘录

- 139 阳光下的备忘录
——关于几位知识分子的
命运及其思想轨迹的采访
140 也许并非套中人
144 播下龙种以后
149 历史的暗角
152 欲济苍生犹未晚
156 假若命运能够选择
160 屠夫用血洗手
164 不再天真
168 无法直面的人生

174 无头无尾的三个故事

走访人生

183 红色革命之后

190 从“现行反革命”到哈佛教授

201 一个独身女性的人生

211 从辉煌到孤寂

223 死刑犯、名作家和两个妻子

241 后 记

思想的风景

老舍自投太平湖，他是出于一种无奈。法捷耶夫也是出于一种有别于老舍的无奈，这里暂且不论。法捷耶夫的勇气和痛快倒是值得称道的，远比那些死守已经『陷落』的阵地做『一贯正确』的抵抗者可贵，因为我以为那自杀，虽是一种绝望，但也是一种觉醒。

从李辉说到蓝英年 ——读《寻墓者说》随笔

我喜欢读李辉和蓝英年。

读李辉作品时,那种苍凉是难以名状的。我想平常待之,但心里总是涌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一位位中国文化大师的幽灵,让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从一个角度看,我理解他们,同情和可怜他们的无奈与“沦落”。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无论是坚守城堡还是缺失自我,都自然或不自然地扮演了悲剧角色。共和国这段历史是不能回避的,而现时表达空间又是有限的。面对这些旧人旧事,李辉贡献了自己的思考。有挑剔者指摘,我说,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由李辉到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我只能感叹:历史是惊人的相似。收在《寻墓者说》里的文章,其实我大都在《读书》等杂志上断断续续读过了,近读董乐山先生《寻墓者并不孤独》(见1997年2月8日《文汇报》),又勾起我重读蓝先生系列文章的兴趣。蓝英年作为北师大教授、苏俄文学翻译家,早已闻名遐迩,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国内译本很多,唯他和张秉衡的合译本

“原汁原味”，不但折服了中国的读者和专家，而且深得俄罗斯汉学家的推崇。孰料蓝先生在友人的劝说下，译笔一搁，突然写起了“关于苏联作家”的随笔，且一发而不可收，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蓝英年何许人也？”连我这个文学爱好者也知之甚少，因读外国文学时大都容易滑过译文作者。而今，蓝先生又以《寻墓者说》而轰动，大概与他一九八九年后三次赴苏俄远东大学执教三年有关。他亲历了苏联的解体，有机会接触了大量克格勃档案。我想，这恐怕是他写好“寻墓者”系列的原因之一。

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苏联历史，当然不用遮掩和避讳。于是他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聚焦对准苏联一个个“谢幕”作家，解剖一个个亡灵或冤魂，找到能引发读者共鸣的豁口，让人在他那平静的文字里找回失落已久的良知，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空间。表达是艰难的，但沉默又是痛苦的。前不久，有机会去京城拜访蓝先生，我说，你写的虽是苏联作家，但从他们身上分明看到许多中国作家的影子。他听了，淡淡一笑，继而沉默良久不语，脸上掠过几许无奈和难言。此刻，我眼前倏地晃过李辉笔下的那一位位中国大师的目光，如周扬，如胡风，如“三家村”。我无意将日丹诺夫、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与中国的哪位大师类比，也无意拉出巴别尔、匹里尼亚克等等与中国的某某、某某相比。我只是想，我们为何迟迟没有西蒙诺夫式的“回忆录”？（西蒙诺夫系苏联著名作家，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执行官，斯大林的“宠儿”，六次获得“斯大林奖金”。1979年去世前未写完的《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被誉为一本说真话的奇书，披露了大量的历史真相，但直到1988年才得以出版。中译本1992年后在大陆流行。）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悲悯。但到底，我还是选择了宽容——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无论他们得意或失意，当他们属于权力和意识形

态战车上一员的时候,成为牺牲品就必然了。他们大都没有留下“精神遗嘱”,但他们的人生已经昭示了一段历史,可歌可泣,可悲可叹。有时我又想,这究竟是谁之错?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错。蓝英年先生的《作家村里的枪声——法捷耶夫之死》是够耐人寻味的了。法捷耶夫是个真实的人,也自杀得光明磊落。他无法改变自己,于是选择了死——死是最完美的解脱。读此文,我觉得应受到谴责的是苏共中央伪造遗书。大概这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吧。

李辉和蓝英年都是理性而智慧的。观照来看,前者常常娓娓道来,而又加以恰如其分的主观切入,让人警醒和反思;而后者则是精当运用史料,平常道来,逼人去体味“历史”二字的真谛和沉重。我们曾经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原来那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庄严的文字背后埋葬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带血的故事呵!面对历史和将要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除了感叹和扼腕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老舍自投太平湖,他是出于一种无奈;法捷耶夫也是出于一种有别于老舍的无奈,这里暂且不论。法捷耶夫的勇气和痛快倒是值得称道的,远比那些死守已经“陷落”的阵地做“一贯正确”的抵抗者可贵,因为我以为那自杀,虽是一种绝望,但也是一种觉醒。中国没有类似的自杀者,是可幸还是悲哀?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原载《文汇报》1997年5月3日,《杂文选刊》1997年第8期转载)

风声雨声读书声

——《政治中国》告诉我们什么

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一本真正可读的书，面市时往往免不了有种种传言。如一九九四年《顾准文集》出版后，我就听到关于将查禁此书的传言；一九九五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遭同样的传言，说是将禁了。其实，这些书一版再版，活力不衰。最近今日中国出版社推出的《政治中国》，又遭此传言。我就是冲着这传言，才买了一本来读的。

《政治中国》是一本直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书。全书收文四十篇，作者有李锐、李慎之、吴敬琏、邓伟志、董辅弼、朱厚泽、秦晖、何清涟、王跃生、刘军宁等三十余人。虽然文章全是公开发表过的，但因个人阅读条件所限，仅有三分之一的篇什我曾经读过。编者说，这本三十万言的书，几乎是近几年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思考的全部文章——这里说“全部”，也真让我们有点寒碜和无奈，但细读这些文章，我们也足可自慰：毕竟有这么多人，在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正如此书序文作者江平先生所言：“‘敏感’能否构成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